

苏雪林与天主教

◎王玉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本文认为雪林的道德伦理观更多地体现了旧道德的力量在她身上的过分附着,但同时也有基督教注入其中并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雪林的文艺观的独特性,则是基督教文化最终内化的结果,在此种意义上,雪林的信仰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文化认同,具体的道德实践,而使信仰得到升华,具有了形而上的超越意义。

关键词 苏雪林 天主教

一、皈依天主教

苏雪林年幼时生长在封建迷信盛行的家庭环境之中,所见到的庙宇里的各路神仙大多是让人不敢正视的妖魔鬼怪,所听到的故事也都是僵尸吃人,冤鬼索命,棺材盖飞逐人的一类鬼话。这些荒诞阴暗的印象给她的童稚之心以很大的“精神伤害”。十四岁那年,雪林随祖父到了上海,其间雪林参观了徐汇教堂,她为教堂的庄严神圣和教会人士的和蔼可亲所感动,认为天主教是世间最美丽,最严肃的宗教,并表示自己将来不信教便罢,要信就必信天主教。1913年,雪林随家迁往安庆后,被家人送往当时教会设立的培媛女学,但这里的教育并没有给她留下好印象。总之,雪林早年对天主教还只是非常肤浅的表面认识,还谈不上喜欢,但是信仰的种子已经播下,只待合适的机会便会平破土而出。

1921年,雪林赴法国的中法学院留学,在这里海蒙女士对雪林认识和皈依天主教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海蒙女士全力劝导雪林信仰耶稣,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海蒙女士作为虔诚基督徒的高尚品格深深影响感化了雪林。另外,此时雪林与未婚夫的感情出现了严重危机,未婚夫的冷漠绝情使她陷入爱情的痛苦深渊,“人们受着精神的痛苦时,本来不容易消释,至于这痛苦是关涉爱情的,自然更是难堪”。虽然少女高傲的自尊心受到创伤,但若因此而解除婚约,又将增加父母的伤心,这同样是雪林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此时雪林遭受来自爱情与亲情的双重煎熬,无疑此时她是最软弱的。仁慈的基督向她伸出了大能的救援之手,雪林因为信仰天主教,在同学中被完全孤立起来,这也必然会使她对自己当初的信仰选择产生反悔心理。但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在天主圣神的引导下,雪林的信仰生活也结出了硕果,这在她对无玷圣母的依赖中可见一斑,她认为世界上可爱的除母亲无其他,其爱情的对象除了母亲,更无第二个,她说“这位母亲究竟在哪里,我说不明白,但她的存在,却是无疑的”。她体会到这位天上的母亲,“以她的大爱随时羽翼,保护着我,以她深情蜜意深深吻我,亲我,拥抱我”,因此她不再有孤独寂寞和忧伤痛苦。在圣母的大爱里,她与去世的母亲再次相遇共融,她品尝到了圣母之爱的甘怡。若没有深度的信仰生活,怎会有如此深刻的灵性体验?

二、旧传统五四新文化基督教三重视野下的文化人格

(一)道德伦理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极尽攻击之能事,主张个性解放,追求个人自由,提倡家庭革命,婚恋自由。许多男女青年以叛逆者的姿态,力图重建全新的家庭秩序,两性秩序。然而苏雪林的在道德伦理上的认识与选择却独具风格。樊笼被打破之后,人们开始挥霍自由,对于心无定见的人,抵制各种诱惑成为一种奢侈。在《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中,雪林以蝴蝶自喻,蝴蝶遭到了来自作为诗人之比喻的蝉,作为学者之比喻的蠹鱼,以及蜥蜴等的求爱追逐,但蝴蝶都以与作为未婚夫之比喻的蜜蜂的婚约为由加以拒绝。可以说“她(蝴蝶)自湖的西边以来,抛掷了多少机会,方得保全了自己得爱情,她要将这神圣芳洁白的爱情,郑重地赠给蜜蜂”。即使在遭到蜜蜂地冷遇以后,她仍充满热切地希望,“我可以知道他的性情,他也会知道我的性情,双方既有缺点,感情融洽之后,也就不觉的了”。一方面,雪林为少女的情欲所冲动,另一方面也没有充足的反对讨厌未婚夫的理由,所以她对未婚夫的感情里面无疑包含了爱情的因子,但是这感情里面却包含了更多的道德责任内容,这在《光荣的胜仗》体现的尤为突出。文章主人公醒秋面临来自秦风的狂热追求,她曾经在秦风精心编制的爱情童话里一度迷失了自己,如同小小的苍蝇陷落在情网之中;但最后,醒秋还是拒绝了秦风的求爱,这固然与她母亲的苦劝有关,“母亲的爱,是这样救了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醒秋自身的理智,她说“但虽然是母亲的爱(救了我),我自己也不能说没有定力,谣言未发生之前,我虽深陷在情网里,却固守心关,没有对他降服——始终没有向他吐露半个爱字”,雪林的贞洁观显然是脱胎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旧式妇女的节烈观,但她并非完全式旧礼教的牺牲品,其中也存在她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她并没有随波逐流,为反封建而反封建,追求无原则的婚恋自由,为争取所谓的独立自由而刻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以隐忍之心,以冷静理性的眼光去对待婚姻,看似逆来顺受,实则有一颗坚强的心,一个坚定的信念,并没有因境遇的起伏而丧失自主独立性。雪林皈依基督后,天主教的牺牲精神,禁欲主义等观念

又更进一步增强了她对自己婚姻选择上的保守倾向。与未婚夫的结合并不幸福,但是人生漫漫,世事沧桑,虽然严格意义上讲,两人只是名义夫妻,但雪林却终身未嫁,以圣徒般的洁德,以基督的牺牲精神,以十字架的愚钝战胜了私欲偏情。她的道德伦理观执拗地近乎愚蠢,但却神圣,有力量。

(二)早期宗教观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地影响,1922年“非基”运动兴起。基督教被等同于封建蒙昧主义思想,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理性主义的审判。一般进步青年视基督宗教思想未洪水猛兽,必打到而后快之。而此时的苏雪林却对宗教报以深深的理解同情之心。首先她肯定基督教视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她承认“人类的肉体和精神,不过是物质的集合和运动”,然而,又认为物质主义和自然主义必然造成对物质享受的过渡要求,造成精神的失落和人生的痛苦,烦恼和虚幻。而且过于“拘泥于物质生活,到头来,也不见得能享受物质生活带来的快乐”,甚至认为中华文明的混乱和中华民族的衰落就是物质主义的结果因此,观点的正确与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这种反主流语态更加反衬了所谓主流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的困境和荒诞意义。其次,苏雪林认为在道德观上东西方文化是相通的。她认为天主教信仰有三种特点,第一是虔洁,第二是热忱,第三是神乐。教徒的牺牲精神是教人感动和钦仰的,教徒的信仰是“人类最高精神之活动,是生命的火焰,是灵性的源泉,它是由感情的激发,它也经过理智的考察的”。宗教有道德之美。孟子的“理义之悦我心,如邹豢之悦我口”。道德之美,原是世界上最高之美,领略了这个美,自然心满意足。基督教之博爱是无私的,是人类真爱的表现。沉浸于“道德之美”的人自然获得了“神乐”。中国圣贤于西方天主教的博爱在道德方面是相通的。

(三)文艺观

苏雪林的文学创作深受桐城派文学的影响,她非常崇拜袁枚,曾说“清代诗人,我顶喜欢袁才子”,对于袁枚的《小仓山房全集》,雪林自幼及老,一直爱诵不衰。其散文创作有浓厚的袁枚影响的印记。袁枚提倡诗文写个人的“性情遭遇”,写个人的灵感,“但肯寻诗就是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主张“性灵说”。考察“性灵说”与基督教文学尤其是圣经文学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圣经的空灵与属神特质与“性灵说”有很大暗合的可能。也许苏雪林无意将桐城派文学与基督教文学相整合,但其实已经在不自觉将两者的融合反映在乐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作作品中了。雪林强调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功能,所谓文以载道,这在她对郁达夫与张资平的文学批评中可见一斑,她批评郁达夫的《沉沦》是“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给颓废猥琐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批评《她是一个弱女子》“可谓集淫文学之大成”;批评张资平“虽然自称为新文学作家,但他专以供给低级的趣味,色情或富于刺激性的题材,娱乐一般中等阶级因而名利双收为宗旨”。他们的作品对国民是一种“精神屠杀”,会造成人们“良心败坏”。苏

雪林批评的锋芒由作品而作家,她批评张资平“作品中常有不良的品格之映射”,三十年代苏雪林的“反鲁”事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批评理由是“一口鲁迅的病态心理,将于青年的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她认为鲁迅的杂感集自《华盖集》:至《淮风月谈》都是攻击个人恩怨的“正人君子”,而且文笔尖酸刻薄,无与伦比。雪林的批评自然有失客观公正,但她由人品而作品的逻辑推理还是与主张率真直性的“性灵说”还是一脉相通的,从此中意义上讲,雪林倒不失文人的诚实可爱。雪林在文艺创作上显然与五四以来的诸作家大相异趣的,她既反对“左翼”作家的红色激进主张,同时也反对以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其实绝对虚无的颓废派的亡国奴德性,毋庸讳言,她曾与国民党右派站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摒弃党派之别的狭隘立场,就会发现,她更多地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而立论的,这在抗战时期她的爱国表现及文学创作中可以征之以实。如果说桐城派文学对雪林文艺思想的形成是起“破”的批判作用的话,那么圣经文学对形成独特文艺思想则起到了“立”的建设作用。圣经文学所体现的真善美爱的价值取向同样体现在雪林的文学创作中,虽然现实婚姻并不幸福,但雪林却通过文学作品去努力发现生活之美,在《绿天》中雪林用一种洋溢的诗意叙写了夫妇之间的鱼水情深,道出了少妇的热情,奔放,和一种阳光明媚般的生活情趣。整部作品围绕丈夫这个中心展开想象,编织了一个玫瑰色的梦境。雪林的另一部作品《鸽儿的通信》,更是一篇通过文学作品杜撰的“美丽的谎言”。这已不仅仅是一种寻求精神自我安慰的形式,而是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怀和宗教内涵: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美善的,上帝的安排都是圆满的,所以作品更具有超越的意义。在雪林的作品中,取材于圣经的意象,故事典故更是举不胜举,例如在《绿天》中以伊甸园为背景的梦幻,《收获》中沙乐美的故事,《灌园生活回忆》中的芥子的比喻,以及抗战时期直接以宗教语言为题的《炼狱》等等,都充分说明圣经对雪林文学创作的影响。

总之,雪林的道德伦理观更多地体现了旧道德的力量在她身上的过分胶着,但同时也有基督教注入其中并发挥潜移默化作用;雪林的早期宗教观更多体现乐雪林游离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边缘人的角色,同时也体现了她对基督教文化的认同感,可称之为“文化基督徒”;雪林的文艺观的独特性,则是基督教文化最终内化的结果,在此中意义上,雪林的信仰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文化认同,具体的道德实践。而使信仰得到升华,具有了形而上的超越意义,整个人生境界发生根本改观,进入乐“化境”。在《当我老了的时候》,雪林写道:“我死时,要在一间光线柔和的屋子里,瓶中有花,壁上有画,平时不同居的亲人,这时候该来一两个坐守榻前……灵魂早洗涤清洁了,一切更吾遗憾。就这样让我徐徐化去,象晨曦里的一滴露水的蒸发,象春夜一朵花的萎自枝头,象夏夜一个梦之澹然消灭其痕迹”。这也许是一个经历太多的人生坎坷,超越了感性和理性的一个基督徒的最理想归宿吧。

苏雪林与天主教

作者：[王玉鹏](#)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 湖北·武汉, 430079](#)
刊名：[安徽文学（评论研究）](#)
英文刊名：[ANHUI LITERATURE](#)
年，卷(期)：2008, ""(1)
被引用次数：0次

相似文献(1条)

1. 学位论文 田一颗 论苏雪林的文化品格 2007

苏雪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她一生勤奋，执笔时间长达80年，执教达50多个春秋，出版著作50余部，被誉为现代文坛上的“常青树”。苏雪林一生跨越两个世纪，经历了一百零二年的风风雨雨，曲折的生活道路影响着她的思想历程，进而使她成为一位性格复杂的作家。

苏雪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她支持国民党政府而在解放后移居台湾。在她的身上有明显的“守”与“叛”的特点，“守”表现在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珍视和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依从；“叛”则表现在敢于争取自我的解放和发展。她对婚姻的态度和选择经历由叛逆到妥协、放弃个人选择的过程；她对天主教的皈依也经历了一番思想上的矛盾挣扎；她受五四“理性”主义的影响，却在学术批评和对鲁迅的态度上，表现出情感偏执的特点；她早期的散文表现了女性阴柔和富于童心的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苏雪林的思想风格更呈现出的是“尚武”的一面。

可以看出，苏雪林行事风格和道德立场是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的，探究其原因，包括家庭环境、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自身的性格等。苏雪林虽然出生在浙江瑞安，却始终生活在她那个正统的徽州家庭文化氛围之中，从小就受到浓郁的徽州文化的熏陶，而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她形成了很强的思维定势而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思维框架。另一方面，在“五四”运动开始那一年苏雪林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平上学，她亲身感受到一切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她的文化品格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热爱而又对新文化充满憧憬，代表了新旧交替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成为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典型，而苏雪林对事业执著勇敢追求的一生和她所遭遇到的困境及超越，也提供我们省思和学习的地方。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hwx200801147.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10156159-eac1-4e41-aedc-9e4d00720858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